

东亚经纬

2014 年第 3 期

【本期要目】

◆观察与思考	1
构建 21 世纪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新思路(祁进玉).....	1
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 合作与创新(刘江永).....	7
多边框架中的中日战略合作与问题(姜跃春).....	16
9 世纪浙江海商与新罗海商的协同合作(李美子).....	24
◆书评.....	27
书评:从“书籍之路”到“东亚坐标”(聂友军).....	27
◆学术动态.....	32
◆征稿启事.....	39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

2014 年 9 月 30 日

构建 21 世纪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新思路

中央民族大学 祁进玉

在现有的复杂的国际氛围和东北亚地区紧张的态势下，解决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纷争，必须要抛弃原先的单一模式的构建经济共同体的设想，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有必要构建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新思路。因为单纯的经济上的联系只是维系国与国关系的经线而已，在可能的情形下，有必要建立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联系密切的交往网络体系，这种网络体系是出于双边或多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科技等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平等交往。基于东北亚地区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民族文化历史、族际接触与交往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充分发挥该地区众多跨界民族在文化、历史上的密切联系和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并以之为区域多边关系交往交流平台，积极构建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这才是顺利解决该地区纷繁复杂的政治纷争的可能路径。

一、构建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遵循的原则

（一）文化共同性原则

东北亚区域的各个国家在文化上尤其有更多的共同性、近似性。文化共同性原则，主要反映在宗教、文化伦理以及普适性的价值观等

方面。宗教上除了俄罗斯的东正教外，其他几个国家如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等国或多或少受过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影响；民间信仰中东北亚地区曾经在广大范围的地域流行萨满教，直到今天民间萨满教的遗俗犹在；反映在文化观念、价值观、社会伦理方面的便是同源异流的儒学伦理思想。儒学的散布，在东北亚的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甚至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东北亚国家组成的版图可以看出，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从地缘上讲无疑都属于东方文化圈，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构成了区域文化的主流。而俄罗斯具有明显的“大陆桥文化”的双重特点，强化了东北亚区域内文化的多元化差异，但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文明冲突”。集体主义的亚洲价值观是东北亚各国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实基础，也是构建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和建构东北亚地域认同的黏合剂。基于此，也有研究者指出，正是东北亚区域这种宏观主流整合性中的“同”，即同根源、同基础和微观支流分离性中的“异”，即发展中的民族文化个性，它们的有机结合给东北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创造力。东北亚地区不同的民族正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学习、借鉴、融合，形成了相同的文化内核并保留了自己文化的个性。总体而言，东北亚区域各民族间共生的文化基础是稳固的，尤以儒学传统与思想深入人心。在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朝鲜、蒙古等国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与伦理道德传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其中“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天下”集体价值观念，追求“和谐”、“中庸”以及“天人合一”的终极价值理念方面，有着共同的人文底蕴和共享的价值体系。这些共享的价值体系与文化判断力，可以提供一个基于共享的文化道德价值观而建构的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参与各方可以进行有效交流与互通有无。

（二）基于该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互补互利原则

简而言之，就是共同体的建构有利于区域整合各自分散的力量，从容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其他地域集团的挑战和竞争。然而，其内部也

是充满拒斥与纷争、博弈与妥协。有研究者分析认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项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要想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立足现实基础，发挥原有优势，加大开放力度，综合运用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制度创新等多种手段。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日韩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为充分发挥东北地区与日韩的互补优势和地缘优势，加强与日韩企业的经济贸易往来创造了新的机遇，为中日韩经济合作筑起了新的平台。同时，日韩企业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一方面有助于中国东北经济的振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日韩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推动日韩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其国际化进程；缩小日韩两国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增强竞争优势，拓展中国市场。

（三）共生性原则

“共生”是指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人们存在的那种彼此互利地生存在一起、缺此失彼都不能生存的相互关系。韩国学者李承律提出的互利共生的思想，是基于下述的考虑：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开创一种立体协调的合作空间，一种共生的世界，于其间各国制造业、金融、信息产业、文化诸方面的合作得以重合和交融，各国在语言、文化、宗教、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得以克服和超越，这是东北亚未来发展的新路线图。有研究者认为，反思 20 世纪的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经验教训，概而言之：两强凌一弱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落后挨打”的必然；处强邻之间只有自立自强才是唯一的出路；国家之间的关系只靠“友谊”不能维持长久；处理国家间关系“妥协”必不可少；应该牢记“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的历史教训，遵守“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准则。也有研究者深入地探讨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提出了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基本构想。分析了东北亚地区各大国构成的安全格局，特别是美国地缘战略对东北亚多边安全体系的影响。在建立东北亚安全秩序方面，

认为确立新的安全观，重新构建东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是其重要的文化基础；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是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制度保障；建议推动“中俄朝”三边、“中日韩”三边和“中美日”三边安全对话与磋商，在朝鲜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框架下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

二、 构建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基于上述的三点原则，该区域的各个国家从各自的现状和历史出发，充分认识到遵循互利共生的原则，对于区域民族关系以及国与国的交往、政治、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理论层面的文化相似性或共同性讨论，与现实中的情况毕竟还是有着很大的分歧，事实上的差异可能超越这种文化同一性或趋同性分析，那么可以说，学术研究的文化共同性与事实上的文化践行的巨大差异，往往说明了一个朴素的目的，那便是社会建构论在发生着作用。东北亚基于共同文化溯源的讨论本身，便是建构社会认同的原意。但是，我们研究的本意在于从此种建构的文化认同，想象一种“文化经济共同体”成形的可能及其趋势，这便是在全球化的场景中讨论一种地缘意识及其缘起、发展的初衷。

（一）形成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条件

从世界政治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同样显示出逐渐强化的区域化交往和建立区域共同体的尝试，而且这种趋势日益明显。我们从“欧盟”看到了文化的力量，欧洲国家因为文化传统上的相似或相近，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区域性的经济共同体联盟，在欧盟的发展历程中，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脉络，成为维系欧盟的重要生命线。“东盟”的出现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而“北约”则只是一个政治、军事的短暂联盟，参与各方出于各自利益的综合考虑而缺乏对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这种军事政治联盟只能是相互利用，其效用也是有限的。

在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中要具备下列条件，才能有利于共同体的顺利发展，这些要素包括：区域内各国政府间合作的需要和政策意志；协作体制和组织机构；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意识；地缘认同意识；社会资本的互动与共享；民间经济文化交流与分享。韩国学者则认为，形成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条件包括：政策意志；协力体制；文化理解与认同；社会资本的积极与活用等要素。但是，虽然中韩学者对于共同体的认识和表述存有差异，但是关于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的作用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于文化交流与协作体制的重视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二）构建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模式选择及其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熙德研究员认为，在宏观思路东亚合作始终面临如下选择：应首先循序渐进地推动功能性合作，还是应优先构筑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机制？在具体思路，东亚合作面临四种不同思路：（1）先经济合作，后政治与安全合作，最后是文化领域合作；（2）政治与安全合作先行，然后是其他领域的合作；（3）经济与政治、安全合作相并行；（4）先有文化共同体，然后才有其他领域的共同体。他认为从现实看，目前东亚共同体建设正处于经济一体化的初期阶段。因此，东亚合作离实现政治、安全、文化一体化还有遥远的距离。关于东北亚共同体的未来似乎遥不可及，在中日韩等一些国家中不乏持有类似的观点的学者。似乎区域的政治、安全和经济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只有建成稳固的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才会迎刃而解。韩国学者对于东北亚共同体的认识似乎也是较多赞同“文化共同体”论，此外诸如“文化连带”（关联）论、超民族共同体论、未来型共同体论等观点和理论，但是其实质基本上依然强调文化交流与政治互信、重建超越民族国家的跨文化认同意识的主旨没有改变。

东北亚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使得任何幻想建构东北亚区域共同体的想法毫无例外地会遭遇很大的阻力，而该区域的任何变化也会波及地区的均衡和稳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

经济等的复杂的现状就对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抱有疑虑，而无视该区域历史和现实中作为最大公约数的共同文化基础及其感召力。相反，在东北亚共同体的构建中首先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增进民间友好往来和相互了解，通过对基于共同文化的跨民族国家的认同来重建东北亚的地缘认同意识，从而建构东北亚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经济贸易往来，增进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与安全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并非如有些学者提到的，构建东北亚共同体必须从上述四种模式中选择其一，而是围绕着东北亚共同体的建设，应该是“多管齐下、同心协力”才能有效。

首先，做好东北亚区域认同的文化共同性基础，营造“和而不同”、“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和谐文化氛围，同时充分调动文化同质的特性，建构基于地缘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复合认同意识。其次，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保障机制和政治互信磋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同时增强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构建经济协作共同体是必需的环节，以经济共同体为纽带、以文化共同体为基础，以政治和安全保障体制建设为依靠，构建政治共同体和地区安全保障同盟为其着力点。然而，在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中日韩作为核心力量，应该抛弃历史宿怨，营造和谐交流的文化认同氛围，强化中日韩经贸往来，增进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

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合作与创新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刘江永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业已确立，现在需要战略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东亚不仅要实现经济一体化，还要考虑如何建立与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安全保障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共同塑造安全、繁荣、和谐、友爱的新东亚。下面我想就建立“东亚核心共同体”(East Asia Core Community— EACC)设想，谈几点看法，供大家讨论。

东亚地区在地理上由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组成，而中国大陆将这两部分连接在一起。目前，东盟 10 国加中日韩合作机制已形成东亚共同体的雏形。如下图所示，未来 20 年如何把“10+3”建设成“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这一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家园，是实实在在的战略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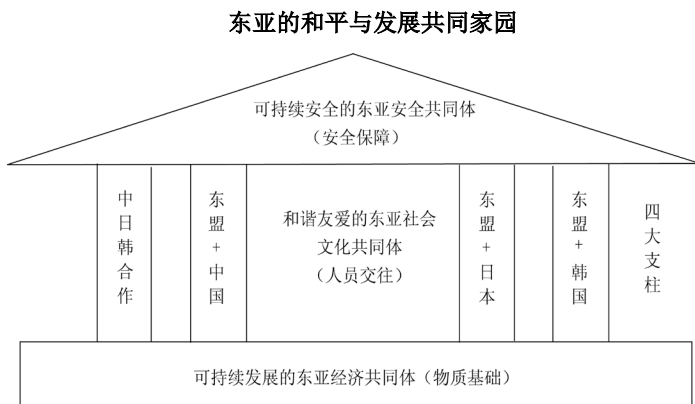


图 1 “10+3” 前景：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蓝图

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与中日韩合作

“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包括生态环境共同体、资源能源共同体、贸易金融共同体。如果“10+3”合作框架未来能全面建成自由贸易区(FTA)，就意味着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基本形成。“东亚峰会”、APEC可与其相互补充。

中日韩三国分别同东盟及其他一些国家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FTA)或经济合作伙伴协议(EPA)，但彼此之间仍处于研究阶段。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日韩都有各自的难处，一些弱势产业需要保护。但是，伴随东亚经济的发展，东亚各国之间互为市场、互为客源、互通有无的巨大动力，势将催生区域经济一体化。

2009年中日贸易总额为2288.5亿美元。中国对日出口979.1亿美元，进口1309.4亿美元。今年头7个月，中日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4.9%，达1676.7亿美元。同期日本来华直接投资同比增加1.2%，为23.5亿美元。

2010年7月，日本放宽中国旅游者赴日签证限制后，中国赴日旅游人数明显增加。今年头7个月，中国赴日旅游人数同比增长38%，为119万人次；预计全年可能增加1倍以上。

据日方统计，2000年在日本出口总额中，对华出口比重仅占6.3%，对美出口则占29.8%。而2009年却发生了战后以来首次逆转，在日本出口总额中，对华出口比重猛增至18.8%，一举超过对美出口所占比重的16.1%。

据日本专家预测，2020年日本出口的27—33%、进口的37%将依靠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常识的日本政治家，都不能不重视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日之间的一些矛盾也只有在战略互惠的大框架内设法妥善解决。

表 1 日本对外贸易中美国与中国所占比重 (%)^①

	日本出口		日本进口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2010 年	20 (16.1)	18 (18.8)	13	28
2015 年	18	22	11	32
2020 年	17	27	9	37

未来中日韩可以在以下七个方面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1) 通过缔结投资协定，实现相互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加深节能环保、信息通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循环经济领域的产业合作，带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在各方条件成熟后争取缔结中日韩 FTA。

(2) 中日韩展开城市交流合作网建设，进行大型项目合作开发。中国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日本和韩国可以在建设可循环经济、绿色环保、科技研发城市，特别是城乡下水道排水系统建设方面，选择样板，参与合作。例如，中国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园区开发等。

(3) 观光旅游业将有力促进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和人员的自由往来。日本可对游客进一步提供签证便利化，在 2020 年之前逐步实现对等免签。冲绳可效仿韩国的济州岛先行一步。

(4) 中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与朝鲜半岛及日本之间可实现海陆空互联互通。中国大连、天津至香港的大陆沿海港口与日本冲绳之间，可开辟相互放射的海上客运“金三角航线”。根据未来中国大连与烟台之间、中韩与日韩之间海底隧道建设的前景，需要考虑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化、便利化、一体化、人性化。

^① 表中数据系根据日本财务省 2009 年实际统计数据测算。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经济研究センター 2006 年 12 月预测整理。

(5) 伴随图们江开发区和环黄渤海经济圈的进展，在中韩 FTA 谈判过程中，中方可考虑对来自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进口商品优先减免关税。这既有利于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探索新的国家发展模式，也有利于未来实现东北亚区域经济、交通运输的一体化。

(6) 俄罗斯作为本地区的能源大国，中日韩可与俄罗斯建立原油、天然气管道网络，有关各国可优势互补，在能源开发、节能、环保、气候变化等方面展开密切合作。2010 年中国先旱后涝、俄罗斯全境大火蔓延、日本 113 年以来的酷热等，都与持续干旱有关。加强气候与极端天气科学研究与减灾防灾的国际合作十分必要。其中，水资源利用、科学的人工增雨雪非常值得研究和探索。

(7) 中日韩应携手合作，发挥各自长处，加强同东盟的经贸、金融合作与政策协调，建立亚洲共同债券市场，实现贸易的当地货币结算比重，在东北亚与东南亚缔结 FTA 的基础上，推动“10+3”成为“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

二、建立“可持续安全的东亚安全保障共同体”与中美日关系

冷战后东亚建立起第一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未来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可以在东盟安全共同体和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在 ARF 或“东亚峰会”框架内适度发展。

其必要条件是：第一，东盟如期建立安全共同体，东盟国家之间保持和平与稳定。第二，六方会谈促使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实质性进展，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能够建立。第三，东亚安全共同体需要制定相应的国家行为准则、相互信任措施和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第四，参与国必须遵守《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原则，而不得将本国或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凌驾于本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之上。第五，东亚安全共同体必须超越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维护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

未来东亚安全合作难以排除美国的参与。中国并不反对美国参与东亚安全事务，但反对美国及其盟国干涉台湾问题，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介入中国与亚洲邻国的领土及海洋权益之争。

首先，需要明确，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目的，是通过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各国共同的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其目的是以较低的安全成本，确保国家与公众可持续的全面持久安全。它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

在传统安全领域，要通过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本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和平的多边主义”不仅相关各国之间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同时也不对外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坚持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国际争端。这一点与北约组织完全不同。

作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目标之一，还可考虑建立东南亚和东北亚无核区。现有核大国应承诺不对本地区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彼此之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关国家可以在反恐、反走私与贩毒、反海盗、防治跨国传染病、维护生态环境等跨国安全问题上，加强合作。这有利于东亚地区增强相互信任、防止军备竞赛、降低安全成本、提高安全质量、确保可持续的共同安全。

其次，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立，还需要确立新的地缘战略概念——“海陆和合论”。它提倡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彼此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促进东亚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

东亚地区由内陆国家、海洋国家、半岛国家、群岛国家、海陆兼备国家等组成。在地缘政治方面存在复杂的相互制衡。彼此之间围绕领土、海洋权益划分的矛盾尖锐。

如果没有东亚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的和平与合作，就根本不可能建成东亚共同体。超越地缘政治制衡，利用地缘经济优势加强区域合作，是东亚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这就不仅需要海洋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合作，更需要海陆国家之间建立和平合作伙伴关系，妥善处理彼此之

间的各种矛盾。例如，妥善搁置争议、实现共同开发，建立海上军事热线等互信措施等。

三、建立“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与欧洲经验

东亚共同体的一个特色，应该是建立“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汉字、儒学是这一地区文化相近、价值相通的基本特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倡建立和谐社会，与世界各国共建和谐世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倡建立友爱社会。鸠山“友爱”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来自欧洲一体化启蒙思想家、奥地利人考登霍夫·卡莱吉。“友爱”其原意是“博爱”，与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仁爱”有相通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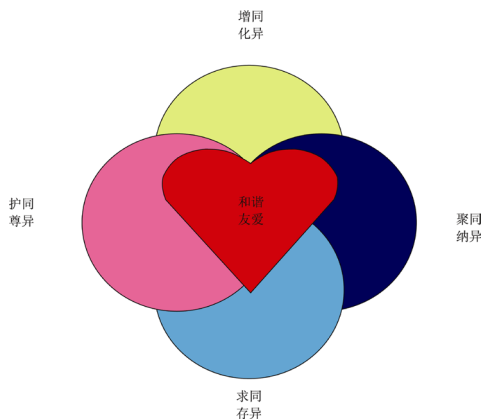


图2 和谐友爱、多元并存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

卡莱吉生前既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也反对苏联的“集权模式”，主张欧洲走向大同。实际上，战后的日本否定了军国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新中国否定了“苏联模式”，坚持和平发展。历史在证明，中日两国越走越近，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观越来越多。东亚共同体或许正是中日两国殊途同归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东亚可

以在通过借鉴欧洲经验的同时，依靠合作与创新走出自己的道路。

我曾请教过法国驻华大使苏和(中文名)有关欧洲一体化的经验。他说一共有五条：第一是法德和解，德国对纳粹的历史予以了彻底清算；第二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决断，即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这两位被两国公认的杰出领袖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第三是在做法上从易到难，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法德煤钢联营开始，逐步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第四是欧洲各国之间人员自由往来，相互交往日常化、频繁化增进了民众之间彼此的了解；第五是在安全领域形成共同的政策和地区机制，加强了战略互信。

这些经验都值得亚洲参考。其中之一是，日本要像德国在欧洲那样，彻底放下历史包袱，真正融入亚洲；同时也可像英国那样成为美亚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中日两国应该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成为海陆和合的典范。

四、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的基本框架与东盟的作用

东盟计划在 2015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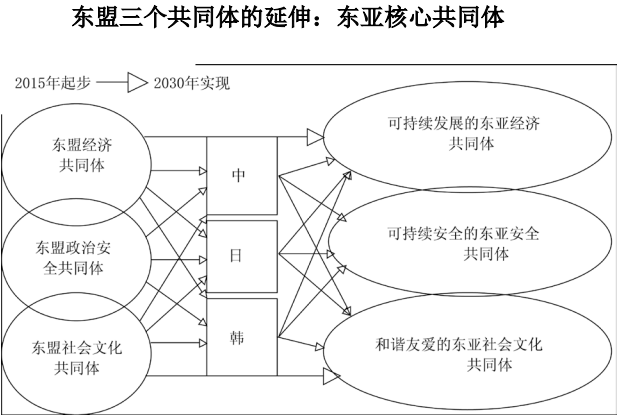
中日韩三国在加强相互合作的同时，可继续共同支持东盟发挥主动精神，建立以“10+3”为主体的“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形成向整个亚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放射型的多元共存、相互补充的多边区域合作体系。

历久教训证明：任何一个大国企图主宰东亚地区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抵制，最终必然失败。二战期间日本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惨遭失败；冷战时期美国企图在亚洲构筑遏制中国的同盟网，图谋宣告破产；20 世纪 70 年代前苏联提出建立亚洲安全体系，也遭到各国反对而夭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有两条基本经验：第一，多边合作体系的建立需要较为健

全的双边关系做基础；第二，由中小国家联合发挥主动精神，而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大国主导，最有利于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取得进展。

东盟国家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便发挥着大国之间粘合剂的重要作用。“10+3”合作机制事实上已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圈与基础链。今后 20 年，东亚共同体建设将是把“10+3”合作机制提升为“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的过程。2015 年东盟若能建成三个共同体便将迈出重要一步。其后，中日韩可与东盟的三大共同体接轨，续建共创“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其路线图如下：



目前东亚地区合作并不存在中日主导权之争，因为东盟一直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今后中日两国应继续鼓励东盟发挥主动精神，并在湄公河区域开发方面加强协调，积极合作。未来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好主导作用则有三个必要条件：1. 东盟国家内部的稳定；2. 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3. 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合作。三者缺一，东盟的主导地位都可能受到制约或影响。中日韩应共同促进东盟的稳定与发展。

“东亚峰会”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亚和大洋洲等东亚地区以外国家。与“10+3”相比，“东亚峰会”机制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未来有几种发展的可能性：

(1) 如果在东亚峰会范围内，印度、澳大利亚与东亚国家缔结 FTA，就将形成“亚洲——大洋洲经济共同体(Asia Oceania Economic Community— AOEC)”。

(2) 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加入，可能使“东亚峰会”与 APEC 成员没有多少区别，从而削弱 APEC 存在的意义。如果其讨论政治安全议题，又可能取代 ARF 的作用，最终与 ARF 并轨。

(3) 美国、澳大利亚、秘鲁于 2008 年加入了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等四国 2006 年发起签署的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环太平洋伙伴协定(TPP)”。未来，如果 TPP 成员与东亚接轨，有可能起到推动 APEC 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作用，但难以包揽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以上多边合作进程有可能相互补充。只要有利于和平与发展，中国都积极参与，乐见其成。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需要改变“只要没有我参加我就反对”的老大心态。其实，欧盟就没有美国参与，而美国从来没有反对过欧盟的存在，因此也毫无理由反对东亚国家建立“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东亚与美国有着巨大的经济贸易纽带，没有必要排除美国。但如果美国愿意加入东亚共同体，就要做好与本地区国家缔结 FTA 的准备。问题在于迄今美国在出口贸易方面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在进口方面时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尚不具备加入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因而就现阶段比较现实可行的目标而言，还是考虑在未来 20 年中日韩如何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地缔结 FTA，进而首先把“10+3”建成“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

多边框架中的中日战略合作与问题

——以 2009 年中日互惠合作局面的深化为中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姜跃春

2009 年，日本政局发生变化，鸠山新内阁上台。新内阁调整了日本外交政策，重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继续发展，使中日关系不仅在双边关系层面上得以健康发展，也使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一、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进一步发展

2009 年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继续深化的一年。其主要标志是高层互访频繁、两党交流活跃。高层互访频繁。而且，2009 年是近年来中日两国首脑互访较为频繁的一年。4 月 29 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访华是上半年中日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麻生太郎首相在其发表的演讲中，驳斥了“中国威胁论”，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机遇”。胡主席在会见中特别强调“两国是永恒的邻居”，“战略互惠”关系不断发展为两国关系的未来打下了好的基础。9、10 月份，胡锦涛主席先后两次会见了鸠山首相，就中日两国共同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鸠山表示：“日本政府愿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同中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发展。”^①他还说：“许多日本国民都衷心希望日中关系能更好，我将倾听国民的这种声音，继续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②10 月 10 日，温

^① 2009 年 10 月 11 日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0171942.html>。

^② 新华社 2009 年 9 月 16 日电，
http://news.sina.com.cn/w/2009_10_09/112618795054.shtml。

家宝总理与前来参加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的鸠山首相也举行了内容充实的会谈。12月14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正式访问日本，受到国宾级的礼遇。

党政交流活跃。2009年1月9日，中日举行了第九次战略对话，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与日本外务省次官藪中三十二在东京举行的会谈中，就双边、地区以及重大国际问题展开坦诚、深入、务实的交谈并达成广泛共识：认为中日作为亚洲和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不仅要处理好双边和地区的问题，也要在全球问题上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11月19日到22日，中国外长杨洁篪访问日本，就中日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许多共识。12月份，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包括140名议员在内的近600人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胡锦涛主席会见了小泽一行，并就共同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一致。

军方互动增加。11月26日，中国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梁光烈正式访问日本，与日本的防务大臣进行会谈。双方就继续稳步开展和推进各城市、各领域交流达成九项共识。其中，包括继续开展两国国防部门领导人与军队高官之间的互访活动。2010年还举行中日防务的安全磋商、开展两国军队间的交流、继续开展舰艇的互访、适时举行海上联合搜救训练等内容。这是中日军方交流方面的可喜进展。显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交流，军事层面的互信有了积极进展。

此外，民间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也十分活跃频繁。两国互派多批次的学生、学术、企业等民间团队互访，使得2009年中日民间外交继续前行。

二、两国在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不断拓宽

鸠山内阁成立以后，日本外交进入调整期。新内阁强调“友爱”亚洲、亲亚外交；主张在重视日美关系的同时，也将重视亚洲，重视

与中国的平衡外交政策。

中日韩合作机制化成为中日两国地区合作的新平台。2009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在北京如期举行。这是三国领导人继2008年12月中日韩首脑在日本福冈首次会晤以来在“10+3框架”之外的第二次会晤。如果说2008年中日韩首脑会晤是三国会晤的起点，那么2009年北京会议则是三国领导人会晤机制化的重要标志。

会晤后，三国发表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和《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标志着包含中日双边关系在内的东亚区域合作正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快速发展。作为三国间的政治共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宣布：“三国致力于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致力于区域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日益加强。”^①

多年来，中日、中韩、日韩双边经贸关系一直发展较好，但三国之间的制度性合作则始终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即便在过去三国首脑有过会晤，也都是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的框架下举行的会晤。2008年以来开始的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是独立于“10+3”框架之外的会晤。从2008、2009年两次会晤所签署的协议内容看，三方不仅确立了公开、透明、互信、互利、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等合作的基本原则，也就相互促进的方式推进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更大范围的合作达成协议。

三方一致同意在政治上建立稳固的对话机制的基础上，确认争取在2010年较早时期内签订日中韩投资协定，以此来推动三国经济合作协定(EPA)的谈判进程。在环保科技方面，三方同意启动东亚气候

^①新华网2009年10月10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0/10/content_12207110.htm23。

伙伴计划，共同研究沙尘暴的监控、早期预警和防控，解决本地区空气污染问题。在社会和文化事务方面，将探讨在建立双边搜救合作机制基础上提升三国海上搜救合作的可能性。

另外，三国首脑同意在能源领域继续互利合作，同意将在东亚建立高效和无缝链接的国际物流体系，促进贸易便利化和经济增长；同意继续加强包括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机构等在内的相关部门间的金融对话与合作，以实现地区的金融稳定等。中日、中韩、日韩合作已经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

由此可见，中日韩三国首脑的会晤将成为中日两国首脑将中日关系发展成为地区中的中日关系的新平台。同时也将为中日两国在未来共同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作用。

东亚共同体将成为中日地区合作的新途径。2009年9月，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相的日本民主党新政权成立后，在外交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其中提出日本在重视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应制定更加重视亚洲的政策，具体内容就是建立“东亚共同体”构想。2009年9月21日，鸠山首相在与胡锦涛主席进行的首次会晤中，阐述了“东亚共同体”的理念。在10月份举行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东亚共同体”作为三国共同致力于实现的长远目标，被写入《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鸠山首相称，日本政府的方针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立足于“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同时以构筑“东亚共同体”作为长期目标，积极推进亚洲外交。合作可从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环境、救灾等可行的领域着手。最重要的是合作伙伴间逐步推进地区性合作。^①

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尽管有日本新内阁力图提升自身执政地位、树立日本国家形象的背景，而且实际运作起来也有相当困难，但此举毕竟符合当今世界区域化不断进展的大趋势，有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

^① 2009年9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讲话，见外交部网页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rbt/jzhsl/t584819.htm>。

进程的积极意义。因此，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建立东亚共同体，促进东亚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和平，是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也是东盟和中日韩各方的共识。^①

三、中日两国不断深化合作的主要背景

（一）日本新内阁对华政策调整为中日深化合作提供了可能。2009年日本政局变化，民主党上台执政，改变了自民党半个世纪以来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日本政坛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民主党内阁上台以来，对日本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新内阁表示要正视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并表示绝不参拜靖国神社。这无疑对排除过去多年来制约中日关系的政治障碍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新内阁还表示要继续坚持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已有框架，并同意继续深化其内涵。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在世界经济中块头的不断增大，中日两国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中国已经变成其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伙伴。

新内阁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持续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将为日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也符合双方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即使在两国间存在分歧的东海问题上，鸠山首相也表示，要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希望东海成为和平之海、友好之海、合作之海。正是由于日本新内阁对华政策的积极调整，使得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得以进一步强化，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

（二）“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出台为中日合作提供了地区空间。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速发展；东亚各国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要求日益增强。在2001年的“10+3”会议上，出现了设立东亚峰会的呼声，之后不久又出现了建立“东亚共同体”并使之作为东亚合作最终目标的政策主张。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召开，

^① 2009年10月10日人民网，http://www.022net.com/2009/10_10/424664203158924.html。

会议强调东亚各国应本着平等的伙伴精神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加强合作，增进友谊，创造和平环境，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安全、繁荣作出贡献。会议将“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多边合作的远景目标，并已在东亚各国中形成了共识。然而，东亚区域合作也包括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始终还没有一个区域内国家均能认同的框架，在具体合作模式和领域方面也存在不少分歧和不同思考。

在一定意义上说，东亚区域合作目前处于如何继续深化的关键时期。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地区大国，也是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区域一体化进程进展如何，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的合作。在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进一步发展、地区合作处于选择如何推进的关键时期，中日两国都希望将促进东亚区域合作作为未来地区合作的重点之一；共同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在“10+3”框架、东亚峰会和中日韩等区域机制中的协调与配合，共同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三）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激活中日两国的合作欲望。始于2008年9月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之后的又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它不仅使美欧为代表的西方经济陷入全面危机，也使增长势头较好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为应对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沉重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世界性机构，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俄印巴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前所未有的合作。事实说明，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程度不断加深，没有世界国家的通力合作，就无法确保各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日本和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大国，也是外汇储备世界排名前列的国家。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日两国不仅具有合作的条件，加强合作也符合两国经济自身的需要。

四、在多边框架中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中日关系是具有地区属性和世界属性的双边关系。在中日关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将成为今后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首先，强化地区意识，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过程中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飞速发展。与欧洲、北美相比，东亚区域化进程相对滞后，如何加快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已经成为全体亚洲国家的共同意愿。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大国，在致力于亚洲振兴、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不应成为竞争对手，而应成为合作伙伴，不应成为在一山相争的二虎，而应成为牵引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两股力量，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不断发展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

其次，强化世界意识，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合作中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不断进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已经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如气候变化、金融风险、能源安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恐怖主义、军控、裁军与防核扩散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世界各国的配合与合作，方能有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中日作为地区大国，有责任和能力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加强国际合作是我们的选择，在国际合作中能够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第三，正视现存的问题，以更加长远的战略目光处理两国关系。我们在对中日关系给予良好展望的同时，还必须清楚地看到，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与日本向“正常国家”转变，中日首次同时作为两个国力强盛的国家出现于东亚，这一现实使得中日两国在相互依存关系不

断增强的同时，一些潜在的矛盾，特别是安全领域中的互不信任依然会不断出现。如果两国不能从战略高度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双边关系，将给两国的发展，地区的和平、安全，以及世界经济的繁荣带来巨大负面效应。为此，中日两国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战略的高度来思考中日关系，才能使双边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为人类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9 世纪浙江海商与新罗海商的协同合作

浙江工商大学日语学院 李美子

在 9 世纪东亚气候变湿冷的大环境下，东亚各国都迎来了灾荒-饥荒-社会动荡局面。在中国大陆牧区南进，农作物生长期缩短，粮食歉收，饥荒连年，百姓流亡，社会动荡。此时浙江的自然灾害更为严重。永贞元年(805)，江南润、池、湖、杭、睦、宣、衢、婺等州大旱。次年元和元年(806)，“浙东大疫死者过半”，仅婺州“人饥亡，户口亡十七八”。白居易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从元和四年(809)到十二年(817)年间，浙江地区一直都有大规模灾荒发生。据日本学者山崎觉士的研究，8 世纪浙江金衢盆地一带因农作物收获一直较好，出现周边人口流到金衢盆地的现象，但是到了 9 世纪以后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金衢盆地一带很多人口流到浙江沿海地区开始从事海上贸易。从事对日海上贸易的徐公直兄弟和詹景全、李达都是金衢盆地的婺州人，他们后来流到苏州、越州海岸地区从事海上贸易。

韩半岛也同样面临着 9 世纪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据《三国史记》记载：“七年(815)、秋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西边州郡大饥、盗贼蜂起”、“八年(816)、春正月…荒饥民抵浙东食者一百七十人”、“九年(817)、冬十月人多饥死”、“十一年(819)、三月草贼遍起”。在这些文献记录中我们可以了解韩半岛西边州的饥民流向海外抵达浙东的情况。但是从其他文献中无法确认这些 170 名新罗饥民的去向。《日本纪略》弘仁十年(819)六月十六日条载：“大唐越州人周光翰、言升则等乘新罗人船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四年(839)正月八日条载：“新罗人王请来相看，是本国弘仁十年(819)，流著出羽国之唐人张觉济等同船之人也”。这两条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罗人”。此“新罗人”是否与来到浙东的 170 人名新罗饥民有关系。

周光翰、言升则是大唐越州人，他们也可能是像前面提到的徐公直兄弟和詹景全、李达都等同样，逃避 9 世纪初的灾荒从金衢盆地流向越州的灾民。当初他们根本没有乘船的经验，更不熟悉海上贸易活动。同时来到浙东（包括越州）的新罗灾民也在异国他乡面临生死的紧要关头。在同样的遭遇面前，中韩两地灾民基于人类最自然的、最强烈的生存欲望，很自然地组建成协同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即周光翰、言升则等越州人借助于海上逃难过来的、又是海上活动经验丰富的新罗人，新罗人也同样得到当地灾民的资源，协同开创新的生存活动模式，即海上贸易。浙东沿海地区是东北隔海与新罗相望，距离相近，况且百济国时代开始与中国南朝有过海上交流的传统。韩半岛西南海岛-清海镇遗迹中出土的越州青瓷就足以说明浙东人参与新罗人海上贸易活动的历史事实。

查看九世纪中后期的文献记录，很多渡日商船的启航地和返航地是明州、台州、温州、福州等江南沿海的诸多港口。日僧空海文集《高野杂笔集》里有写给渡日僧一杭州盐官灵池寺僧侣义空的信函，据此信函，徐公裕于 848 年、849 年、852 年三次渡海去日本，都是从明州出航。据日本的《安祥寺资料账》，日僧惠运于 842 年 8 月 24 日在肥前国松浦郡远值嘉岛那留浦乘坐叫李处人的船，抵达温州乐城县玉留镇府前头。还有 853 年日僧円珍来中国的时候乘坐的船也是王超、李延孝、钦良晖等为船主的商船，此船从日本九州出海，抵达的是福州、温州、台州等港口。文献把他们记载为“大唐商客”，或者是“新罗商人”、“渤海商主”或者“本国（日本）商人”。可是，到了 860 年代以后，从文献史料中找不到“新罗商人”的踪影。对此日本学者田中史生考察 9 世纪日本大宰府推行的有关新罗商人的管制政策之后，认为当时新罗人来日时为了逃避日本的管制政策，故意冒充唐人身份。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816 年逃到浙东的新罗饥民，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异国生活，他们已经在语言、生活方式上接近中国人，特别是到了 9 世纪中后期，他们的第二代子孙开始从事海上贸易。这些新罗人的第二代子孙不需要冒充唐人，已经在语言、生活上都融入

到浙江海商的群体之中，因此日本方面分不清新罗商人和唐商的区别。由此认为 9 世纪初流入到浙东的新罗饥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海上贸易活动中就渐渐地融入到浙商之中。

书评:从“书籍之路”到“东亚坐标”

——评王勇教授主编三卷本《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史研究》、《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聂友军

何为“东亚”，历来众说纷纭。而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的最狭义限定与西嶋定生(にしじま さだお、1919--1998)的“东亚世界”说最广为学界所接受。历史上以中国、朝鲜、琉球、越南及日本为代表的东亚诸国以汉字及儒学为纽带，联结成一个文化的整体，是为东亚文化圈。伴随着当前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国际交流形式多样化的进程，文化领域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狭隘界限，不同文化间世界性交流的平台初步搭建，民族文化走向开放，世界文化倾向多元成为趋势。在此语境下，有别于传统的国别研究及中—日、中—朝(韩)的单线研究，将东亚整体纳入视域的“东亚学”应运而生。

东亚学以作为一种文明概念的东亚为研究对象，以东亚文明的发展为研究的大背景与大视角，对作为整体的东亚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进行立体的、综合的贯通考察与系统研究，强调其在文化与文明方面的贡献与影响，兼及东亚当下的常规问题与热点问题，最终反映出中国学者眼中的总体东亚形象。

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王勇先生主编的三卷本大著《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史研究》和《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以下简称“东亚坐标书系”)作为“中国书籍文库”大型丛书之三种 2013 年 1 月由中国书籍

出版社出版，其问题意识之独特、论述思辨之严谨及关涉领域之深广，正是这种“东亚学”学术理念的结晶与华丽呈现。近年王勇教授提出“书籍之路”（Book Road）这一学术概念，既借鉴又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尝试建立东亚文化研究的新模式。这一学术创见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与积极响应。相较于以物质文化层面交流为主的丝绸之路，书籍之路理论强调凝聚着更多中华文明精神创意的典籍所具有的强大的再生机能，它们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及参与所在国文化建构的意义。

王勇教授以书籍之路为突破口，梳理中国典籍文献在东亚流播的路径，剖析它们在所在国文化生成与演变中的功用，同时关注书籍之路外围的国际关系与历史背景，分析不同时代东亚文化交流在途径、方式、载体与侧重点方面的差异，由是汇通了书籍之路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提供了理解东亚文化交流的别一种视角。

在东亚坐标书系中，王勇教授在书籍之路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东亚坐标”理念。无论“书籍之路”还是“东亚坐标”，倡导者都倾向于将之视为东亚研究的一个“抓手”，而无意人为地将之调适成一个“体系”。因为随着学科的日渐细化，如今已没有条件催生出文艺复兴时代那种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结构的学者，并且任何理论、方法与理念都有其适用范围或历史局限性，加之研究对象千差万别，试图一劳永逸地套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无异于镜花水月。东亚坐标理念不仅将研究领域从中国—日本、中国—朝鲜等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扩容至整个东亚，而且将关注重心从典籍流播拓展到遣隋唐史、跨国人物等更广泛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东亚坐标理念为方兴未艾的东亚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方法论依据。试分述如下：

人文学者应该秉持大视野，小心态的治学态度。所谓大视野，强调立志须高、入门须正；所谓小心态，讲求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东亚坐标书系《总序》中，王勇教授从为“东亚”这一语词正名入手，从词源学、观念史、翻译学、方法论和亲身体验等侧面系统论述了“东

亚”与“东亚坐标”的问题，见解颇为深刻。学问的积累，都是后人踏着前人的肩膀艰难前行的，而不自知的学者往往囿于自己的专业一隅，对相关学科与邻近学科的新知视而不见。西方习见“刺猬型”学者与“狐狸型”学者二分法。王勇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兼具“刺猬型”学者精深钻研与“狐狸型”学者转益多师的长处。阅读东亚坐标书系，“跨学科”相互启发、触类旁通、发人所未发的见解随处可见。转益多师、广泛择采可将原本相距甚远、甚至对立的力量捉置并处，产生出一种生成性的张力，这种张力在研究的可操作性这一目标要求下形成合力，推进学术向纵深发展，并刺激新的学术生长点产生。

东亚学研究需具备明确的文化主体意识。在叩问东亚何以为东亚的同时，尚需以东亚为参照系来落实中国何以为中国。王勇教授在《总序》中谦逊地称：“如果说我的学术成果受到西方主流学者的某些认同，我想那是我站立在东亚的土地上研究东亚，我是当事人，不是旁观者。”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中国学者所从事的东亚学研究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东亚坐标”为研究立足点的执着立场。

人们对事物和现象的观察总是从特定视角出发，此时产生的洞见必定以另一些视角的放弃为代价；相应地，也会产生另一些盲点。在东亚学研究中关注西学相关研究可以克服单一文化视角带来的盲点与褊狭。但试图借重西方理论图解任意研究对象的做法已成强弩之末；用自己艰辛的研究去证明产生于欧美一隅的某种理论的有效性似可不必。究其根本，当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开创判然有别于西方成规、中国学者独立而自由的学术格局与气象。

东亚学研究强调对文化影响与文化往还的严格实证。文化交流往往不是单向的，而更多地表现为文化往还的形式；确定一种文化影响了另一种文化时亦须慎重，严格实证需要双重甚至多重证据。探究跨文化传播与文化汇通的过程时，要求将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加以认识，以知其然；并审视文化自身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特定文化语境中异文化因素的融入等因素，以知其所以然。

王勇教授在东亚坐标书系《总序》中指出，以东亚为坐标研究东

亚文化有两个要点：“一是以中国为基点，追踪中国文化之传播和影响，彰显华夏文明的世界意义；二是以域外为起点，考察对中国文化之摄取与模仿及创新与回馈的机制，拓展‘汉文化’的文明内涵”。这一宣示无疑承认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异文化背景的人只能相对客观地去了解另一种文化。尊重异文化的独特性，从研究对象自身而不是研究者出发去认识所研究文化的性质，不应单纯依据线性进化的理论构架予以说明。

东亚学研究突出对文化交流中接受主体的关注。对接受主体的研究，应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梳理接受影响的内在理路。以中日文化交流与日本文化的发展为例，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同时，日本逐渐萌生自主意识，并因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对传来的中国文化有一种按需索取的余裕。以固守自身既有的道德原则为前提，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结合自身实际主动选择、自主取舍，并伴随着国内、国际环境与时局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融合混成，导致中日文化短暂趋同后的异质性分野。

东亚学研究注重动态把握研究对象。王勇教授在东亚坐标书系《总序》中还提到：“时间轴与空间轴立体交汇，由此构成动态的‘东亚学’。”东亚坐标书系不仅广泛论及东亚范围内的政府使节、文人雅士、求法僧、留学生、商人、官员、技师、画家、船工等“人”与典籍、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等“物”两方面的文化交流，而且考虑异国因素进入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或社会总体想象的具体途径，以及融入一个时代文化的异国因素与历史记忆、历史忘却及集体无意识的关系，探讨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时人对异国知识场的建构及对异国的想象。

概括而言，东亚坐标书系是一面透镜，聚焦王勇教授及其学术团队近年的研究场域与学术路径；它也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国内国外学界东亚研究的历史面貌与当代进展的一个侧面；同时它还是一面平面镜，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借之反观自身，提升观察、分析与解决东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学术水平，并得到多向度的方法论启示。是以东亚

坐标书系不仅透露出书系本身所蕴涵的内敛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

吉林大学举办主题为“东亚人文纽带的传统与未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7月3日，“东亚人文纽带的传统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吉林大学文学院与成均馆大学BK21+东亚学融合事业团共同举办。来自吉林大学文学院、公共外交学院，韩国成均馆大学等中韩两国语言、文学、外交、政治等方面的知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吉大文学院院长徐正考、权仁瀚、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刘德斌分别作了题为“汉语研究的必由之路”，“从出土文字资料看论语的传入与学习”，“以公共外交夯实中韩伙伴关系的民意基础”的报告。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东亚文学与文化”、“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东亚语言”、“中韩合作与东北区域发展”等内容分组进行了讨论。

（信息来源：吉林大学网站）

第二届东亚调和分析及其应用国际会议 在牡丹江隆重召开

调和分析是研究自然界各种数量关系及其结构的一门学科，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背景。为了促进国内外调和分析及其应用领域的学术交流，加强东亚地区学者间的合作，由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多位著名调和分析学家发起并组织了“东亚调和分析及其应用国际会议”（The East Asian Conference in Harmonic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2014年7月10—16日，由牡丹江师范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东亚调和分析及其应用国际会议在牡丹江隆重召开。（第一届东亚调和分析及其应用国际会议于2013年10月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召开）。共有来自韩国首尔大学、韩国延世大学、韩国忠北国立大学、美国韦恩州立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女子大学、东京都立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等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调和分析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参加会议。

国际著名调和分析学家、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终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讲座教授陆国震博士在开幕式上致辞。会议期间，有 40 余名国内外专家在会议上做了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涉及国际调和分析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在偏微分方程等领域的应用。

（信息来源：牡丹江师范大学网）

第二届东亚民法学术大会在延边大学召开

2012 年 08 月 29 日，由中国延边大学、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法学研究会、日本私法学会、韩国民法学会和我国台湾地区财团法人民法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东亚民法学术大会——“民法视野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延边大学召开。

七十余位国内外学者和司法实务界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次会议分为东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与最新发展、新形势下的消费者权益扩张、东亚消费者契约的争议问题与展望、东亚消费者权益损害赔偿制度的比较法经验四个议题。此外，在大会进行期间，还举行了关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若干问题的小型研讨会。

（信息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国际研讨会“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 在长春举行

2014年8月24-25日，第二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协办。



来自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27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集中探讨了东亚秩序的理念与构造，东亚世界的朝贡关系，中国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东亚与近代中国、日本，古代与近代的朝鲜问题等理论与现实问题。

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形成了极好的学术交流氛围。通过对话，与会者们增进了对彼此研究方

向、近期研究重点以及研究进展状况的相互了解，同时也进一步拓展和更新了东亚问题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召开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中日关系的现状、未来”学术研究会



2014年9月9日，由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主办的中日国际学术研究会“东亚经济一体化与中日关系的现状、未来”于吉林大学召开，中心主任李晓教授主持了本次研究会并做了题为“美国经济金融化与”的主题演讲。日本筑波大学大学院名誉教授、国际亚洲共同体学会会长进藤荣一教授、日本伊藤忠商事理事、原日本阪南大学教授石田护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庞德良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研究员沈海涛教授，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张虎博士等先后就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中日关

系，中日贸易结构变化及其在东亚地区贸易中的地位，日本安倍经济学的性质与前景等问题做了精彩发言。此后，各方专家进一步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

（信息来源：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网）

福建泉州市举办“东亚文化教育传统与学前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09月28日，“东亚文化教育传统与学前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举行。在为期两天的议程中，来自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学者专家，围绕“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比较”、“传统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改革”、“促进东亚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与交流。本次研讨会共收录了中、日、韩等海内外学前教育研究学者的论文42篇，并集结成册。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潘懋元在为该论文集作序时表示，中韩日文化由于地缘关系，历史上相互交融，在文化教育传统和学前教育方面可相互学习交流。

论坛期间，韩国光神大学幼儿教育科教授金熹贞教授、台湾台中教育大学教授黄嘉胜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虞永平等分别作《发展韩国幼儿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案》、《台湾幼儿园大班美感领域课程教学内容之设计》和《幼儿园教师培养：发展与对策》等报告，就幼儿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教学等问题深入交流研讨。

（信息来源：东方网）

“佛教与东亚文化”国际研修班在京举办

2014年7月14日至21日，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佛学研究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在北京共同举办了“2014 佛教与东亚文化国际研修班”。此次研修班课程丰富，云集中外学者，不仅有以陈金华教授、James Robson 教授、高田时雄教授等为代表的资深教授们的倾囊相授，还有来自美国、俄国、法国、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青年学者的学术探讨。学者们不分地域与国籍，相聚在什刹海书院，探讨佛教与东亚文化。在王勇院长的推荐下，我院研究生华雪梅于2在北京参加为期8天的佛教与东亚文化国际研修班。

（信息来源：《东亚经纬》编辑部）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编辑部